



徐奇渊解读政府工作报告：5%左右增速目标比较稳健，稳增长政策宜尽早推出



意见领袖 |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3月5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京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下称“报告”）。

报告提出今年发展几个量化的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5%左右；城镇新增就业 1200 万人左右，城镇调查失业率 5.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3%左右；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等。宏观政策方面，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赤字率拟按 3%安排；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产业政策要发展和安全并举。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用真招实策提振市场预期和信心”、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等。

总的看，今年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较为稳健，财政货币政策取向也偏向稳健，金融风险、优质头部房企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等三大领域的经济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工作得到进一步强调，对科技创新和数字化转型的重视和产业政策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

经济增速目标为什么是“5%左右”？我国今年实际经济增速潜力如何？怎么理解今年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主基调？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应如何出招？如何评估当前安全性考量在产业政策中的重要性？人口形势变化又将给经济增长带来哪些影响？

对于上述问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特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徐奇渊分享了他的观点。

他总体认为，考虑到内部形势和外部环境，5%左右的经济增速目标设定和 3%的财政赤字率安排坚持了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政策基调。2023 年我国有很大希望可以实现明显高于 5%的增速，与此同时，今年可能也是我国巩固产业链供应链全球地位的较好时机。

单纯从供给端的角度来看，人口老龄化目前还没有对 GDP 增长构成真正的约束。我国当前面临的主要压力，不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而是和年轻人失业率较高伴随的对现有劳动力资源、人力资本的利用不充分；主要矛盾仍然是总需求不足，消费者、企业的信心和预期有待改善。稳增长、稳就业、稳收入信心的政策，宜尽早推出，从而尽量减少伤痕效应的消极影响。



以下为访谈实录

1: 政府工作报告将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设为“5%左右”，相较于此前预期，这个数字似乎并不算高。如何理解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的设置？

徐奇渊：一方面，2023 年年初以来，疫情基本结束之后我国经济活动开始恢复正常，并且考虑到去年的低基数效应，2023 年我国经济增速较为乐观。从年初各地方的 GDP 增速目标来看，31 个省市的数值范围在 4% 至 9.5% 之间，多数省市集中在 5% 至 6.5%，以 6% 居多。

但另一方面，从外部环境来看，2023 年一些主要经济体面临衰退风险，全球经济增速势必较 2022 年出现一定降温。同时地缘政治局势仍有较大

不确定性。由此，5%左右的增速目标是一个比较稳健的目标。在此基础上，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政策基调，2023 年我国有很大希望可以实现明显高于 5%的增速。

2、通胀方面，尽管此前普遍预期今年通胀压力会一定程度的上升，但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目标依然是“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3%左右”，与去年保持一致。您怎么理解通胀目标的设置？

徐奇渊：从国内来看，我国消费会有明显回升，这是支撑今年国内通胀维持在一定水平的主要力量。

但从国外来看，全球增速将有明显回落。需求方面，海外需求将会走弱；供给方面，大宗商品价格也将低于去年。这些因素将有助于减少我国输入性通胀的压力。总体而言，全年可以实现 3%左右的通胀目标。

3、在宏观政策方面报告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赤字率拟按 3%安排”，这一水平高于去年的 2.8%，但低于 2020 和 2021 年；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3.8 万亿元，较去年有所提升。您如何评价今年赤字率水平和地方政府专项债新增限额的设定？如何看待今年财政政策的力度及可持续性？

徐奇渊：从财政一般公共预算赤字率的信号意义来看，3%的赤字率虽然低于 2020 年初、2021 年初定下的目标 3.6%、3.2%，但从过去十多年的常态情况下的目标设定来看，这一数字已经处于最高水平。这一方面表

明我国经济已经走出了三年疫情的最困难时期，财政发力程度在边际上有所调整，并且兼顾了财政可持续的考虑；另一方面也表明，我们对于国内外经济面临的新挑战、新困难也有充足的认识和准备。

4、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去年的提法是“灵活适度”。您怎么理解和预测今年货币政策的力度？其在当前环境下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扩大总需求的作用？降准、降息是否具备操作的空间和可能？

徐奇渊：从外部环境来看，今年全球通胀压力有所回落，但仍然处于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美国经济基本面有些超预期，这可能支持其加息过程超出原来的市场预期。要在此背景下来观察中国的货币政策空间。

一方面，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已经具有相当的弹性，这意味着我国货币政策相对于外部环境的独立性较强，有条件根据国内情况来实施自主的货币政策。

另一方面，降准、降息都有一定空间，但当前我国货币政策面临的更大问题是传导机制不畅，货币流动性转化为信用的过程面临阻滞，消费者、企业等微观主体的信心、预期有待进一步改善。

5、在两会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央行副行长刘国强提到，“对结构性货币政策供给进行评估，做好分类管理，做到有进有退”。对于今年结构性货币政策的“进”和“退”，您有哪些建议？

徐奇渊：量化宽松概念的提出者理查德·维尔纳教授最近评论道，在“造钱”这件事上，各国央行应该向中国学习。他认为，在中国的非常规货币政策（也就是结构性货币政策）框架下，银行创造的信贷主要用于生产、供给端的投资，这样其在促进增长的同时就不会产生通胀。因此，我国的结构性货币政策比欧美以前的宽松货币政策更具有可持续性。尤其是如果银行主要针对小公司增加贷款，那么这将带来更公平的增长。

不过我认为，中国和欧美的货币政策应当互相借鉴、互相学习。我们的财政、货币政策在生产型、投资型领域做得更多，欧美的宏观政策可以向我国学习。同时，欧美宏观政策在稳定消费，尤其是在疫情冲击下缓解居民行为的伤痕效应方面做得更多。

从我国当前国民经济循环的供求两端来看，总需求不足，特别是消费者信心不足是主要问题，从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宏观政策也需要更多关注消费这一端。

同时，结构性货币政策也要处理好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在一般情况下，财政政策更擅长处理和应对结构性问题，而货币政策在一般情况下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52910

